

“全球南方”在数字地缘政治中的协同实践研究

吕晓莉 车微微

[内容摘要] 面对西方国家以技术垄断、数据剥削与文化规训为特点的数字霸权侵压,“全球南方”基于相似的历史遭遇和共同的发展诉求,以数字协同实践谋求破局之道。在基础设施层面,分层发力建设数字公共基础设施,根据自身技术实力差异构建梯度协同体系;在数据治理层面,通过数据保护立法,依托开源生态实现数据资源共享,积极参与全球数据治理规则制定;在文化方面,将本土文化符号数字化,借助多元主体打造去中心化文化传播生态。“全球南方”数字协同实践意义重大,但在推进过程中也面临数字鸿沟、地缘政治双重挤压、数据治理制度碎片化等障碍。展望未来,“全球南方”还将持续强化内部自主能力,深化南南及三角合作,从而革新全球数字治理体系,使全球数字生态朝着更公平合理的方向发展。

[关键词] “全球南方” 数字地缘政治重构 数字霸权 协同实践

[作者简介] 吕晓莉,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车微微,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D85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715(2025)04-0068-23

当今世界,数字技术正以前所未有的深度重塑全球权力版图。在以人工智能、大数据与数字基础设施为角逐焦点的新一轮地缘政治博弈中,西方国家凭借对数字公共基础设施的掌控优势,将“全球南方”异化为数据原料厂与算法实验场,通过知识生产垄断与文化符号传播,构筑起数字时代的“中心—边缘”结构。这种权力失衡不仅表现为技术依附与数据剥削,更渗透至文化认同与规则制定层面,形成系统性的数字霸权体系。

面对这一困境,“全球南方”正以协同实践探索破局路径。中国国家主席习

近平在2024年“金砖+”领导人对话会上深刻指出,“全球南方为发展而起,因发展而兴。”^①这一论述精准概括了“全球南方”的发展脉络与使命担当。当前,“全球南方”在应对数字霸权过程中形成了层次分明的举措:在基础设施层面,以构建技术自主的数字物理根基为核心目标,通过推进数字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夯实数字化转型的底层支撑;在数据治理层面,以数据保护立法为先导,明确数据主权归属与跨境流动规则,依托区域多边合作框架推动数据资源整合,增强“全球南方”整体发展动能;在文化破局层面,“全球南方”以数字技术为武器,通过文化符号数字化转译、语言主权重塑、价值定义权争夺三重路径,推动全球文化生态从“单向同质化”向“多元共生”转型。这些实践推动全球数字权力结构向公正、合理方向演进,成为破解“中心—边缘”困局的关键力量。

一、数字霸权与“全球南方”的主体性觉醒

在数字技术重构全球权力版图的进程中,数字霸权以技术垄断、数据剥削与文化规训三重枷锁,持续维系着数字领域的不平等秩序,将数字公共产品异化为维护自身优势的工具,导致“全球南方”在数字化转型中面临技术依赖与安全困境的两面夹击,发展进程遭受前所未有的挑战。部分学者将这一现象概述为发达国家的“数据殖民主义”或“技术殖民主义”。^②面对数字霸权的挤压,“全球南方”从被动适应转变为主动破局,这是对数字世界“中心—边缘”不平等结构的坚决抗争,也是对全球数字地缘政治的创新性重塑。

(一) 数字时代权力重构中的数字霸权

对数字霸权产生根源的研究可追溯到198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麦克布莱德报告》,该报告深刻揭露全球信息流动呈现出单向性特征,警示了南方国家

① 习近平:《汇聚“全球南方”磅礴力量共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金砖+”领导人对话会上的讲话》,2024年10月24日,https://www.mfa.gov.cn/web/zyxw/202412/t20241218_11497516.shtml。

② Nick Couldry and Ulises A. Mejias, “Data Colonialism: Rethinking Big Data’s Relation to the Contemporary Subject,” *Television and New Media*, Vol. 20, No. 4, 2018, pp. 336 ~ 349; Mirca Madianou, “Technocolonialism: Digital Innovation and Data Practices in the Humanitarian Response to Refugee Crises,” *Social Media and Society*, Vol. 5, 2019, pp. 1 ~ 13.

之间的直接交流极为匮乏,几乎处于空白状态。^① 尽管报告同时提出了构建国际信息新秩序的建议,但美、英等国却以“威胁新闻自由”为由施压,最终迫使此项建议被搁置。这一历史性挫败使“全球南方”未能打破殖民时代遗留的通信依附结构,为数字时代技术霸权的繁衍发展埋下伏笔。

在全球数字格局中,以美国、欧盟为代表的“全球北方”凭借其对海底光缆的掌控,实行了技术垄断。谷歌与 Meta 公司主导的 Equiano、2Africa 等海底光缆私有项目,通过非透明的协议架构与排他性运营模式,塑造了全球数据流权力版图。这些光缆不仅承载着数据传送的物理功能,更通过数据虹吸效应与算法技术,成为西方国家的数字霸权在地缘政治维度的重要延伸。这在非洲表现尤为显著,非洲的海底光缆拓扑与殖民时代的电报线路高度重合。曾作为奴隶贸易枢纽的圣赫勒拿岛,如今仍然是非洲数字网络的核心节点。西撒哈拉与厄立特里亚近海虽有数条海底电缆穿行,却无支线接入,这与殖民时期电报网络服务帝国通信、忽视殖民地需求的逻辑如出一辙,^②印证了非洲数字基础设施的布局仍受制于殖民遗产与地缘政治博弈,揭示了地缘政治在数字空间的内在延续性。^③

凭借对数字基础设施的掌控,西方国家肆意开展数据剥削活动,催生出了“数据殖民主义”这一新型剥削模式。西方技术主体通过实施系统性数据“圈地运动”,将“全球南方”用户异化为原始数据“佃农”,又通过数据攫取与算法规训,建立起数字语言霸权,以争夺全球数据资源分配的话语权。以主流人工智能训练数据集 Common Crawl 为例,其中英语数据占比近半,而非洲、美洲及大洋洲的低资源语言数据仅占 0.1%。^④ 这导致人工智能工具处理这些语言的能力严重不足,使用这些语言的群体在数据聚合与算法筛选的双重机制下被技术性消音,进而在数字生态中愈发边缘化。

① The MacBride Commission, *Many Voices, One World*, Lonham, Mary Land: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03, pp. 52 ~ 61.

② Dhanashree Thorat, “Colonial Topographies of Internet Infrastructure: The Sedimented and Linked Networks of the Telegraph and Submarine Fiber Optic Internet,” *South Asian Review*, Vol. 40, No. 3, 2019, pp. 252 ~ 267.

③ Esther Mwema and Abeba Birhane, “Undersea Cables in Africa: The New Frontiers of Digital Colonialism,” *First Monday*, Vol. 29, No. 4, 2024.

④ Kira Schacht, “Bridging the AI Language Gap in Africa and Beyond,” Deutsche Welle, July 29, 2023, <https://www.dw.com/en/bridging-the-ai-language-gap-in-africa-and-beyond/a-66331763>.

在“数据殖民主义”的权力架构下,数据流动本质上构成了知识与权力的再生产装置。这种数据的流动并非价值中立的信息传递,而是通过算法霸权与平台资本,内置“殖民语法”的文化规训,渗透进数据流动的每一个环节,通过算法对数据的筛选、排序与呈现,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用户对世界的认知与理解。这种由流动偏向带来的知识传播局限,在人工智能应用场景中有着极为典型的表现。当全球各地学生使用 ChatGPT 进行学习时,算法会基于数据聚合形成单一观点,迅速给出答案。这种预设结果可能会导致文化规训,使用户在不知不觉中被左右。^① 这意味着,数字时代的观念鸿沟不再单纯是技术问题,也是知识生产权与意义阐释权被剥夺的政治后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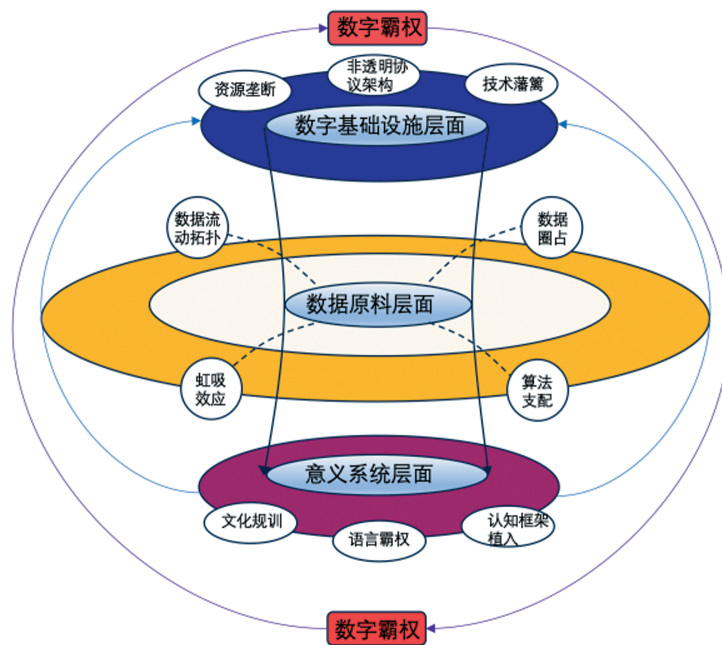


图1 西方国家数字霸权闭合回路

图表来源:作者自制。

^① Soonyee Yoon, “Artificial Generative Intelligence Risks a Return to Cultural Colonialism,” April 25, 2023, <https://venturebeat.com/games/artificial-generative-intelligence-risks-a-return-to-cultural-colonialism/>.

在权力的复杂交织中,数字霸权悄然构建起闭合回路(见图 1)。西方国家通过对数字物理基础设施的近乎垄断,决定着全球数据流的矢量场分布。在数据传送、筛选、整合的进程中,知识生产的价值取向早已被设定为“数据殖民主义”的映射。通过平台内容审核机制与推荐系统的协同运作,英语世界的“普世价值”、消费主义以及个人主义价值观,被潜移默化地植入用户认知体系。这一过程不仅在认知层面进一步巩固了西方数字霸权,更掩盖了“全球北方”将“全球南方”数字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的剥削实质。

(二)“全球南方”的群体性崛起

尽管部分南方国家仍面临发展瓶颈,但作为整体,“全球南方”在国际政治中拒绝选边站队的战略自主、在经济领域对南北不平等秩序的改革诉求、在文化上对多元文明话语权的积极争取,共同构成了群体性崛起的历史进程,标志着全球权力结构正经历从“西方中心”向“多元共治”的历史性嬗变。

在数字时代,“全球南方”的群体性崛起最直观体现为对数字发展自主权的追求。面对西方主导的全球秩序在数字领域的延伸,这一追求本质上是一场从“认知觉醒”到“理论建构”再到“实践突围”的反霸权自主发展进程。

从“认知觉醒”到“理论建构”的逻辑演进,始于对“技术民主化”虚假承诺的清醒认知,这种认知促使“全球南方”从单纯的现象批判,转向以数字主权为核心的理论体系建构。在早期“阿拉伯之春”“伊朗绿色革命”等事件中,社交媒体曾一度被奉为“技术民主化”的典范,承载着推动社会变革的厚望。然而,随着资本完成对数字空间的全方位圈占,数字技术逐渐被异化为西方控制他国的工具。“全球南方”逐渐认清了所谓“技术民主化”不过是西方推行霸权、干涉内政的幌子。近年来,西方以“技术民主化”为名,通过谷歌、脸书等公司实现数据收割与舆论操控,跨国社交媒体干预选举引发骚乱的案例屡见不鲜。剑桥分析公司通过心理画像和精准广告干预多国选举,充分暴露出西方借技术之名、行霸权之实的本质。面对数字霸权,“全球南方”开启从现象批判到理论自觉的跃迁:中国倡

导“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①将数字主权纳入人权框架,推动个体权利与集体发展权的统一;印度总理莫迪以“数据是新石油,新黄金”^②的口号宣示数据主权立场,批判西方科技巨头对数据资源的单向控制;在非洲,多国学者正展开辩论,有学者提出“非洲数字民族主义”,^③呼吁构建普遍的基本数字权利。尽管这些努力都仍处于探索阶段,却已折射出“全球南方”主动争夺数字发展自主权的理论自觉。

同时,“全球南方”以多元实践展开制度性反制,形成了以数据主权争夺为核心、多边协作与本土化立法为路径的系统性反制网络。例如,东南亚国家联盟通过强化区域贸易合作构建价值链,有效防止了西方的数据圈占;非洲联盟以《非盟数据政策框架》确立数据监管体系,将《2063 年议程》中的数字经济战略上升为泛非行动纲领,从立法与战略层面捍卫数据主权;中国“数字丝绸之路”在东南亚、非洲搭建去中心化合作网络;印度依托“数字印度”战略推动南亚数字主权联盟建设。这些多边机制不仅打破了西方主导的技术供给垄断,更通过南南合作形成强大的数字发展合力。“全球南方”的种种举措释放出明确信号:“全球南方”在实践中的主体性、影响力与整体性不断增强,已不再将“全球北方”的技术路径与治理模式奉为圭臬,而是积极构建独立自主的发展路径。

“全球南方”的数字崛起并非静态的权力更迭,而是一场持续演进的动态进程。从认知觉醒到理论层面的自主建构,再到实践层面的积极反制,“全球南方”正将数字空间从“西方治理殖民地”转化为“多元共治试验场”。这些数字领域的实践,既是“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的生动注脚,更是其重构国际秩序的关键支点。曾经处于全球视野边缘的“全球南方”,正以积极主动的姿态重塑全球数字格局。

① 习近平:《在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5 年 12 月 17 日,第 2 版。

② “‘Data is the New Oil, New Gold,’ Says PM Modi in Houston,” Hindustan Times, September 23, 2019, <https://www.hindustantimes.com/india-news/data-is-the-new-oil-new-gold-says-pm-modi-in-houston/story-SphHD-PQadvF1dJRMXHCkwK.html>.

③ International Civil Society Centre, “Digital Debate2: Is Africa ‘Falling Prey’ to Data Colonialism?” April 1, 2021, <https://icscentre.org/our-work/digital-debates-archive/digital-debate-2-is-africa-falling-prey-to-data-colonialism/>.

二、“全球南方”重塑数字地缘政治格局的三重路径

面对西方国家在数字领域的技术垄断、数据剥削与文化规训,“全球南方”从设施、数据、文化三个关键维度出发,开启了重塑数字地缘政治格局的征程。这不仅关乎“全球南方”自身的数字主权与发展权益,更对全球数字治理体系的变革产生着深远影响。

(一) 基座重构:数字公共基础设施的“分层突围”策略

当前,“全球南方”正在掀起一场分层发力、协同共进的数字基础设施革命。所谓“分层突破”策略,是将南方国家数字主权建构视为一个动态梯度协同系统,在承认各国技术存在梯度差异的前提下,引领型国家通过数字合作实现技术势能释放,追赶型国家依托制度完成技术创新转化,基础型国家借助场景与需求推动技术本土迭代,各国以生态位互补作为关键纽带,力求形成协同共生的生态体系。

引领型国家以中国、印度为主。这些国家具备强大的数字技术研发能力、广泛的国际合作网络以及较为成熟的数字产业生态体系,能够在全球数字领域发挥引领和辐射作用。中国的“数字丝绸之路”在推进数字公共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加快建设数字走廊、海底光缆等方面取得了积极进展。在规则标准与政策协调领域,截至 2022 年底,中国已与 17 个国家签署“数字丝绸之路”合作谅解备忘录,与 18 个国家和地区签署《关于加强数字经济领域投资合作的谅解备忘录》。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中国成功构建起 130 套跨境陆缆系统,广泛布局 5G 基站、数据中心、云计算中心等新型数字公共基础设施。^① 印度则通过“数字印度”战略构建起了包含数字身份、支付系统和数据交换平台等组件在内的完整堆栈。这套开源技术栈具有模块化、可插拔特性,能够使许多国家以低成本快速复制。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共建“一带一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实践》,人民出版社 2023 年版,第 43 页。

2008年,印度创新性地推出“模块化开源身份平台”,^①菲律宾是第一个大规模使用该平台的国家,全球另有16个国家正积极开展“模块化开源身份平台”的试点。^②近年来,中国与印度通过对外开展深度数字合作,实现技术与经验输出,成为全球数字格局重塑的重要推动者。

追赶型国家以巴西、马来西亚为首。相较于引领型国家,追赶型国家数字技术基础相对薄弱,在核心技术自主创新方面存在短板,但它们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与庞大劳动力资源优势,能够通过借力国际组织平台、依托发达国家技术体系等多元渠道,持续挖掘自身技术潜能。巴西在2024年担任二十国集团轮值主席国后,积极利用这一组织推进“全球南方”数字公共基础设施议程,并将数字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列为二十国集团数字经济工作组的四个优先事项之一。2023年,巴西参与了约15场有关数字政府计划的双边会谈,并与非洲联盟分享经验,助力非洲的数字项目。马来西亚的数字化进程同样令人瞩目,其互联网普及率超过97%,手机普及率也接近130%。近年来,马来西亚成功吸引了包括谷歌、微软、英伟达在内的众多国际企业布局,成为全球数字资本的重要汇聚地。^③2024年,在“马来西亚数字化”计划框架下,获批的数字投资总额达1636亿马来西亚林吉特,较2023年增长250%,数字产业持续成为该国创造高技能、高收入就业的核心动力。^④这类追赶型国家通过借助外部资源,在区域层面构建起特色鲜明的数字经济生态,凸显了在数字霸权格局下“借势破局”的战略智慧,正逐步成为全球数字领域不可忽视的力量。

基础型国家以赞比亚为代表。这些国家资金匮乏、基础设施薄弱,缺乏自主

① 模块化开源身份平台,于2018年正式搭建,以赋能各国政府为导向,助力它们为民众打造官方认可、安全可靠的身份认证体系,推动社会数字身份治理的革新与升级。参见MOSIP官网,<https://www.mosip.io>。

② Romina Bandura, Madeleine McLean and Caroline Smutny, “Approaches to Digital Public Infrastructure in the Global South: Case Studies of India, Ukraine, Brazil, and Zambia,” August 26, 2024, <https://www.csis.org/analysis/approaches-digital-public-infrastructure-global-south>.

③ U. S. International Trade Administration, “Malaysia - Digital Economy,” September 19, 2024, <https://www.trade.gov/country-commercial-guides/malaysia-digital-economy>.

④ Malaysia Digital Economy Corporation, “Digital Economy Set to Further Strengthen 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in Wake of 5.1% GDP Growth,” February 17, 2025, <https://mdec.my/media-release/news-press-release/377/digital-economy-set-to-further-strengthen-national-competitiveness-in-wake-of-5.1-gdp-growth>.

研发和构建数字体系的能力,多依托国外开源系统、区域协作搭建自身数字体系。近年来,赞比亚的一系列行动,明确释放其对数字公共基础设施发展大力支持的信号。^① 2022 年,赞比亚第八个国家发展规划中明确大力发展数字经济,促进对信息和通信技术及科学和技术的投资,以支持数字转型和创新。在数字公共基础设施建设进程中,通过取消对数字基础设施设备进口的税收,赞比亚成功吸引了约 5800 万美元的投资,这些资金将主要用于提升光纤技术,以实现与邻国的通讯连接。在技术应用上,赞比亚巧用国际开源技术适配本国需求。例如,依托印度“模块化开源身份平台”框架,开发出一套以国民身份证为唯一法律标识的 EKYC 身份识别系统。同时,赞比亚还利用 OpenG2P 平台解决干旱、洪水场景下物资分发难题,提升应急管理能力和^② 赞比亚的“技术嫁接”策略,将国际开源技术巧妙嵌入本国法律与实际需求框架,快速、低成本地构建起数字公共基础设施,为其他基础型国家提供了“以问题为导向、以合作为依托”的数字化转型范例。此外,赞比亚还将实践与开源技术调整经验反馈给开源社区,推动平台更普适、更具功能性,实现反哺。

“全球南方”对数字技术霸权“分层突破”的策略,既尊重了各国在数字技术发展上的梯度差异,又通过协同机制凝聚了南方合力,这种分层次、多向度的技术赋权机制,使各国能够在不同层面参与数字技术的创新与应用,实现了从技术接受者到参与者、贡献者的角色转变。“全球南方”的数字公共基础设施构建超越了单纯的物理设施演进逻辑,是一场构建开放互通、普惠均衡、合作共赢的全球新秩序的集体实践。

(二) 数据治理:数据资源保护立法与开源数据共享

在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的当下,数据要素凭借独特的“乘数效应”大幅提升生产效率,成为推动经济发展与变革的强大引擎。然而,在数据跨境流动国际规则

① Romina Bandura, Madeleine McLean and Caroline Smutny, “Approaches to Digital Public Infrastructure in the Global South: Case Studies of India, Ukraine, Brazil, and Zambia,” August 26, 2024, <https://www.csis.org/analysis/approaches-digital-public-infrastructure-global-south>.

② “DPI Exemplar Stories: Case Studies of DPI Implementation Across the World,” November, 2024,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0zHaTTqdy4XgjzLDhPKd6do6w3Bh2TVE/view>.

领域,全球竞争日益白热化,逐渐形成了以欧盟、美国、英国、新加坡和新兴经济体为核心的五大合作圈。其中,《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及《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这三个多边协议备受关注,它们的数据跨境流动标准高,覆盖人口众多,成为全球数据规则的重要风向标,其规则导向使全球数据合作的公平性面临挑战。

面对这种局面,“全球南方”积极谋求改变。2023年,在“77国集团和中国”峰会上,古巴总统指出,“如今正是南方改写游戏规则的关键时刻。”^①近年来,数据本地化存储成为许多南方国家维护数据主权的重要举措。如俄罗斯颁布《个人数据保护法》和《俄罗斯信息、信息化和信息保护法》、中国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与《“数据要素×”三年行动计划(2024-2026年)》、巴西施行《通用数据保护法》,肯尼亚制定《2019年数据保护法》,古巴、哥伦比亚、印度尼西亚、南非也分别颁布《个人数据保护法》,这些法律法规均对数据存储作出相关规定,反映出各国对数据控制权的重视。据国际隐私专业协会统计,全球已有144个国家或地区实施了国家数据隐私法,使约66.4亿人、即世界人口的82%,受到某种形式的国家数据隐私立法的保护。^②可见,数据本地化存储等举措及相关立法在全球范围内的广泛推进,彰显了“全球南方”对数据主权和隐私保护的重视,努力在全球数据治理格局中争取更平等的话语权。

政策协同在“全球南方”数据保护实践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是提升“全球南方”整体竞争力的关键。当前,“全球南方”正依托区域合作平台和多边合作机制,在数据规则制定上协同发力。2020年,非洲联盟《网络安全与个人数据保护公约》正式生效,要求各国建立涵盖电子交易、个人数据与隐私保护、网络犯罪打击及消费者保护的完备法律体系。在此基础上,《非洲数字化转型战略(2020-

① Cuban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Speech by the President of the Republic of Cuba, Miguel Díaz-Canel Bermúdez, at the Inaugural Session of the Summit of Heads of State and Government of the Group of 77 and China,” September 15, 2023, <https://cubaminrex.cu/en/speech-president-republic-cuba-miguel-diaz-canel-bermudez-inaugural-session-summit-heads-state-and?fbclid=IwAR3ka-E8wi2OLkHRTvVQmlVIELpxUQXIcY4wLVY-Th4CznsFzwDdb-VF5Jw>.

② Aly Apacible-Bernardo and Kayla Bushey, “Data Protection and Privacy Laws Now in Effect in 144 Countries,” January 28, 2024, https://iapp.org/news/a/data-protection-and-privacy-laws-now-in-effect-in-144-countries/?utm_source=chatgpt.com.

2030)》进一步细化行动框架,推动开放标准和互操作性,以构建跨境信任框架、保护个人数据以及保障隐私,为各国数字建设提供了切实可行的路线图。金砖国家同样在数据保护合作方面积极作为。借助《金砖国家数字经济伙伴关系框架》,金砖国家构建起数字技术标准联盟,将数据隐私和安全作为重点关注领域,旨在加强成员国之间在数字技术标准制定、数据安全防护等方面的交流与合作。尽管新兴经济体的数据跨境合作目前还存在协议有限、参与成员不足、规则标准不高等问题,但这一系列政策层层递进,大幅降低了区域内政策摩擦成本,统一标准也增强了集体议价能力,助力“全球南方”在国际数据规则制定中争取到更大话语权。

在数据驱动的时代浪潮中,开源平台因其开放、协作的特性,成为“全球南方”数据流通与共享、实现互助发展的关键桥梁。中国、印度、巴西等部分南方国家不再被动依赖,而是主动投身自主项目研发。印度的开源项目“印度堆栈”与斯里兰卡、摩洛哥等国搭建共享平台,实现了数据资源、技术经验和知识体系的互联互通。借助多边协作框架,技术要素得以在全球范围内优化重组,既降低了边际成本,又打破了核心技术的垄断,极大地促进了各国之间的数据流通,让数据能够跨越国界和组织边界,在更广阔的范围内发挥价值。中国企业研发的“深度求索”大模型以“开放权重”模式赋能“全球南方”,其推出的“深度求索-R1”采用“麻省理工学院许可协议”,为其他国家自由使用、修改和商业化该模型提供了便利,有效打破了西方数字巨头的技术垄断壁垒。不同国家可以基于该模型进行数据训练、应用开发等,使得数据在全球技术创新的生态中加速流动,为“全球南方”国家间的数据流通创造了更有利的条件,进一步夯实了数据流通的技术基础和合作环境。

随着“全球南方”在数据和技术领域影响力的逐步增强,其在全球数据治理规则制定中的话语权也在不断提升。“全球南方”能够凭借自身在数据流动和技术创新方面的实践经验,推动全球数据治理朝着更加公平合理的方向发展,为构建更加公平合理的国际新秩序注入强大动力。

(三)文化破局:文化的数字化转译与价值定义确权

在数字技术重塑全球文化权力关系的进程中,西方依托技术优势与市场主

导地位,通过文化价值输出、资源分配失衡及语言规则制定等手段,持续影响“全球南方”的文化生态与价值认知。面对这一结构性挑战,“全球南方”以数字技术为突破口,通过文化符号的数字化转化、语言资源数字化保护及去中心化价值确权等路径,逐步打破既有的文化权力格局,推动全球文化生态从单向主导转向多元协同。这一进程既是技术赋能下文化自主性的重建,也是“全球南方”在全球数字地缘政治重构中实现主体性表达的重要实践。

早在 1997 年就有学者提出,美国正凭借信息技术搭建起“文化帝国主义”^①的运作模式,塑造全球文化趋同的格局。随着数字技术与人工智能的迭代升级,西方通过数字平台传播消费主义、个人主义价值观的强度与广度持续攀升,“全球南方”本土文化因传播渠道受限与外来价值侵蚀面临式微危机。在此情境下,“全球南方”通过数字技术将承载文明基因的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编码为可流通的全球数字资产,构建起对抗价值渗透的数字屏障。例如,借助数字技术,印度东北部文化符号转化为了可流通的全球数字资产,媒体推动当地文化节庆、虚拟展览走向全球;^②南非的“虚拟游猎”项目,以沉浸式体验为桥梁,向全球观众生动展示其自然遗产的独特魅力;尼日利亚借助数字平台广泛传播本土诺莱坞电影,打破影视产业的地缘壁垒,以本土影视连接全球文化;^③中国的敦煌研究院精心构建“数字藏经洞”与多语种数字展览矩阵,“数字敦煌”资源库访问量已突破 2300 万次,覆盖全球 78 个国家。^④ 这些实践不仅以技术赋能的创新方式显著提升了文化遗产的存续力与传播效能,更成为“全球南方”在新时代展现文化软实力的重要载体,为全球文化生态的多元共生树立了典范。

凭借数字霸权,西方国家将英语中心主义编码为平台默认的算法规则,影响着全球语言的使用和传播,部分土著语言的生存空间遭受严重侵蚀。随着算法

① David Rothkopf, “In Praise of Cultural Imperialism,” *Foreign Affairs*, Vol. 107, 1997, pp. 38 ~ 53.

② Aparna Hazarika, Biswajit Bora and Mohendra Nath, “The Impact of Digital Media on the Cultural Identity of North East Indi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Novel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Vol. 9, No. 9, 2024, pp. 103 ~ 107.

③ Olubukola S. Adesina, “Digital Diplomacy and African Countries: Opportunities, Challenges, and Future Prospects,” 2024, https://pure.giga-hamburg.de/ws/files/49993529/GIGA_DigitalDiplomacyStatecraft_PB_01-2024_Adesina.pdf, p. 5.

④ 王筱依:《数字技术让世界看见更多非遗之美》,《光明日报》2025 年 5 月 20 日,第 3 版。

挤压的不断加剧,非洲语言在自然语言处理领域的代表性愈发不足,而数字文本语料库的匮乏,更是阻碍了非洲语言数字工具与资源的开发。^① 对此,非洲正积极开展自救行动。2019 年,语言专家在南非马坎达齐聚一堂,参加旨在提升南非官方语言之一的科萨语认知度的工作坊。同年成立的南非数字语言资源中心资助科萨语在线词典,有力推动非洲语言数字化保护。^② 此外,开源社区 MasakhaNER 正使用超过 20 种语言的非洲语言数据集进行人工智能训练。^③ 非洲语言实验室“All Lab”成功将 40 多种非洲语言纳入数字化保护范畴。这些实践有力地表明,即使是“全球南方”中数字化基础相对薄弱的非洲,也正凭借语言数字化破除“语言帝国主义”的桎梏,在数字浪潮中为本土语言争取平等的生存与传播空间,构建多元语言生态。

在文化价值定义方面,全球盛行的文化知识产权商业化开发长期由西方主导,文化价值定义权也随之被西方垄断。数字时代,“全球南方”通过推动文化符号的产业化运作与交易,在市场化流通与创造性转化中实现文化价值质的跃升。中国的《黑神话:悟空》构建起技术赋能与商业转化的产业生态链,为“全球南方”数字文化产业发展提供了全新范式。该游戏以《西游记》知识产权为基底,创造性地对国内地理景观展开数字重构,将抽象文化元素转化为可感知、可操作的数字实体。游戏首日发布不久,便在游戏平台 Steam 上吸引超 130 万玩家同时在线。此外,它还通过衍生品设计与品牌营销等商业联动,完成了从文化符号到文化资产的跃迁。^④ 这有力地证明,南方国家无需依赖西方技术或叙事框架,也能够将抽象文化符号转化为具有全球吸引力的数字资产,以商业上的成功挑战西方对“南方美学”的定义权。

① Justus C. Roux, “African Language Resources for Knowledge Societies,” in Russell H. Kaschula and H. Ekkehard Wolff, eds., *The Transformative Power of Langua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0, pp. 209 ~ 231.

② Birgit Ottermann, “isiXhosa. Click: Student-led Project Makes isiXhosa Vocabulary Easily Accessible,” July 24, 2024, <https://sadir.org/en/isixhosa-click-student-led-project-makes-isixhosa-vocabulary-easily-accessible/>.

③ David Adelani et al., “MasakhaNER: Named Entity Recognition for African Languages,” *Transactions of the Association for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 Vol. 9, 2021.

④ Joey Pappalardo, “Black Myth: Wukong Makes Gaming History in Launch-Day Frenzy,” Bloomberg, August 20, 2024, <https://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24-08-20/black-myth-wukong-makes-gaming-history-in-launch-day-frenzy>.

文化是“历史上留下来的存在于符号中的意义模式”,^①是民族身份的象征与国际话语权博弈的软实力资源。“全球南方”国家从文化符号数字化转译对抗西方文化霸权,到在文化价值定义领域打破西方垄断,再到非洲借助本土语言数字化破除“语言帝国主义”桎梏,都是以实际行动推动对文化符号这一软实力资源的深度挖掘与有效运用,为全球文化生态的多元共生与发展贡献“南方智慧”与“南方力量”。

三、数字时代“全球南方”数字协同实践的障碍

“全球南方”开展数字协同实践的进程中面临诸多障碍,制约着协同实践的深度与广度。其中,互联网普及率差异与互联网使用能力的差距、外部霸权干预与南方内部强国的复杂竞合,跨境数据治理规则碎片化以及全球协调机制乏力等问题尤为突出,成为“全球南方”数字协同实践面临的主要挑战。

(一) 数字鸿沟:互联网普及率差异与使用知识能力的差距

数字互联作为驱动高效数字发展的基础支撑,对于各国实现可持续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战略意义。然而,截至2024年,全球仍有约26亿人未能接入互联网,^②其中“全球南方”未联网人口占这一数字的大多数,各国距离国际电信联盟设定的2030年普遍宽带接入目标仍有显著差距。“数字鸿沟”成为全球数字化协同实践中的主要阻碍,集中体现在互联网普及率差异与使用知识和能力的差距两个层面。

“第一数字鸿沟”聚焦互联网接入的差异性,这一差距在地域分布上呈现显著特征。截至2025年2月,中国、印度和美国在互联网接入率中的排名领先,^③但南亚有近10亿人未使用互联网,东部非洲有近3.7亿人口未接入互联网,东亚虽

① [美]克利福德·格尔茨著,韩莉译:《文化的解释》,译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109页。

② 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Union, “Global Internet Use Continues to Rise but Disparities Remain, Especially in Low-income Regions,” November 27, 2024, <https://www.itu.int/en/mediacentre/Pages/PR-2024-11-27-facts-and-figures.aspx>.

③ Statista, “Number of Internet and Social Media Users Worldwide as of February 2025,” April 1, 2025, <https://www.statista.com/statistics/617136/digital-population-worldwide/>.

然是全球在线用户数最多的地区,但仍有 3563 万人未使用过互联网。^① 这种悬殊的差异直接制约着全球数字化协同的基础。以南南跨境电商合作为例,部分“全球南方”国家因互联网使用成本高企,导致消费者难以参与网络购物,其移动宽带、数字设备的高价格背后,实际是市场竞争不足、法规不完善、基础设施共享缺失等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② 互联网接入质量的差异同样值得关注。在部分“全球南方”国家,即便实现基础网络覆盖,低速、高延迟的网络服务仍难以支撑实时数据交互、云端协作等数字化应用。这种“有网难用”的困境,使区域内数字合作平台因技术适配成本过高而难以落地,最终成为制约“全球南方”数字协同实践深化的障碍。

“第一数字鸿沟”进一步催生了“第二数字鸿沟”,即互联网使用能力与行为的差异。即便在接入条件相近的国家间,文化背景、知识水平与规则认知的差异,也会导致互联网应用深度呈现显著分化。以南非为例,其互联网普及率超 50%,但电商渗透率仅 1%,消费者对线下交易的路径依赖,折射出数字素养的长期缺位,从网络购物流程认知到电子支付信任建立,从跨境物流规则理解到商品信息筛选能力,均存在系统性知识缺口。^③ 互联网技术生态的“代际差距”进一步加剧失衡。人工智能作为涵盖计算机视觉、自然语言处理等领域的技术体系,其落地应用高度依赖互联网基础设施的支撑。然而,目前仅有少数国家具备构建“互联网+人工智能”技术生态的能力。麦肯锡咨询公司预测,到 2030 年,人工智能将通过互联网平台创造 13 万亿美元的额外经济产出,推动全球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 1.2%,^④但各国技术应用能力的差异可能导致“技术红利”分配严重

① Statista, “Number of Individuals Not Using the Internet as of February 2025,” February 6, 2025, <https://www.statista.com/statistics/1378504/people-do-not-use-internet-by-region/>.

② World Bank, “Digital Development: Our Framework for Digital Transformation,” 2023, <https://thedocs.worldbank.org/en/doc/b16e2ba1cb754ab47a2dd1b214dd374e-0400062023/original/DigitalDevelopmentBrochure.pdf>.

③ United Nations Office for South-South Cooperation, “South-South Cooperation in a Digital World,” March 18, 2019, <https://unsouthsouth.org/2019/03/18/south-south-cooperation-an-a-digital-world-2018-annual-report-in-south-south-cooperation/>.

④ Jacques Bughin et al., “Notes from the AI Frontier Modeling the Impact of AI on the World Economy,” September 4, 2018, <https://www.mckinsey.com/featured-insights/artificial-intelligence/mgi-notes-from-the-ai-frontier-modeling-the-impact-of-ai-on-the-world-economy>.

失衡:技术领先国家可获取高额回报,而部分“全球南方”国家因数字人才短缺、技术转化机制薄弱,连基础的智能客服优化、数据可视化分析等工具应用都难以普及。这种差距使得“全球南方”在数字经济价值链中往往只能承担低附加值环节,其根源正是数字素养培育滞后与技术应用能力断层的双重制约。

(二) 地缘政治双重挤压:外部霸权干预与内部强国竞争

在数字地缘政治重构中,“全球南方”的协作进程始终受制于双重地缘政治逻辑:外部传统大国的战略挤压与内部区域强国的竞合博弈。这两种力量相互交织可能导致“全球南方”陷入比传统“数字霸权”更为复杂的数字发展格局。

一方面,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通过“印太经济框架”“清洁网络计划”等机制,将数字技术异化为地缘政治工具。“印太经济框架”虽未公布具体规则,却以美国近20年主导的区域贸易协定“美式模板”为根基,围绕“跨境数据自由流动”“数据存储非强制本地化”等议题制定规则,本质是通过数字贸易体系挤压“全球南方”的数据主权与政策自主空间。与此同时,美国还试图在“全球南方”内部制造“技术阵营对立”。如美国系统性抹黑中国“数字丝绸之路”,将其歪曲为“数字威权主义”,^①这种叙事策略破坏了南方国家间基于平等互利原则建立的合作信任,引发部分国家对南南数字合作的疑虑。军事与政治博弈对数字协作的冲击则更为直接。俄乌冲突后,西方对俄罗斯施行半导体禁运与软件封锁,迫使印度、巴西等国加速“数字自主化”进程,但技术积累不足导致区域间技术竞争加剧。“全球南方”在芯片制造、操作系统等核心领域本就面临技术壁垒,自主化进程中因资源有限而聚焦同类技术赛道,引发无序竞争与资源浪费。

另一方面,中国与印度作为“全球南方”的重要国家,其数字战略的互动呈现出竞争性。印度莫迪政府试图将技术优势转化为地缘政治资本,一方面欲通过推广数字公共基础设施替代中国的“数字丝绸之路”,对冲中国在“全球南方”的

^① Robert Spalding, “Data Security in a 5G World: Why It Matters More Than Ever,” March 16, 2020, <https://www.nbr.org/publication/data-security-in-a-5g-world-why-it-matters-more-than-ever/>; Dalibor Rohac, “The Digital Silk Road,” June 10, 2019, <https://www.aei.org/articles/digital-silk-road/>; Anna Mitchell and Larry Diamond, “China’s Surveillance State Should Scare Everyone,” The Atlantic, February 2, 2018, <https://www.theatlantic.com/international/archive/2018/02/china-surveillance/552203/>.

传统影响力;另一方面又谋求区别于西方模式的第三方领导地位,印度人民党的 2024 年竞选宣言明确将数字技术共享作为巩固“全球南方”领导地位的战略工具。这种竞争性战略使得“全球南方”的部分国家在技术合作中面临更多复杂考量,一定程度上影响南南数字协作的信任基础。同时,技术标准与数字生态的差异化推广客观上可能带来兼容性挑战,若缺乏协调机制,可能增加中小国家整合数字发展路径的成本,进而对“全球南方”数字协作的整体性推进形成阻碍。

(三) 制度壁垒:数据治理制度碎片化与全球协调机制乏力

在全球数字经济快速发展背景下,“全球南方”积极开展数字协作,但跨境数据流动领域的制度标准差异与治理机制不协调,严重制约着合作进程。

当前,跨境数据流动的国际管理缺乏统一框架,各国政策导向与管理模式存在显著差异。美国凭借技术优势强调数据跨境自由流动和数字服务贸易自由化,试图通过规则主导扩大全球市场份额;欧盟则在主张开放的同时,出台《通用数据保护条例》,以“隐私保护”“视听例外”等原则构筑制度壁垒;众多南方国家相继出台数据本地化措施,部分国家构建了复杂的数据本地存储政策。这种分散化、差异化的政策格局,使得“全球南方”在开展数字协作时,难以形成统一的数据流动规则,对区域数字经济一体化发展造成了严重影响。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指出,一个国家的数据限制程度每提高 1 个百分点,其总贸易产出将减少 7%,生产力将下降 2.9%,5 年内下游价格将上涨 1.5%。^① 这表明,分散化、差异化的跨境数据流动政策格局,不仅可能阻碍企业间的正常贸易往来,也可能损害区域经济的整体活力和竞争力,不利于全球数字经济的健康发展。

技术标准层面,南方国家面临着标准多样且难以统一的难题。各国在数字身份认证、数据安全、传输响应速度等关键技术标准上差异显著。以数字身份认证为例,由于缺乏统一标准,同一用户在不同数字平台需使用不同身份标识,这不仅增加了用户使用复杂度,还为网络欺诈行为提供了可乘之机。不同国家对

^① Nigel Cory and Luke Dascoli, “How Barriers to Cross-border Data Flows are Spreading Globally, What They Cost, and How to Address Them,” July 19, 2021, <https://itif.org/publications/2021/07/19/how-barriers-cross-border-data-flows-are-spreading-globally-what-they-cost/>.

数据安全防护等级、传输速度要求不一,在数据交互过程中,易出现数据泄露风险,或因传输延迟影响交易流程,降低合作效率与用户体验,削弱了各国开展数字合作的积极性与可持续性。

法律体系的差异也成为数字协作的重大障碍。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与美国《云法案》的规则冲突,使“全球南方”在跨境数据流动中陷入两难境地。^① 遵循欧盟法规可能违反美国法律,反之亦然,这严重制约了南方国家企业的跨国经营活动。这种法律体系差异导致“全球南方”的企业在全球数字市场中面临高昂合规成本与潜在法律风险,严重削弱其国际竞争力。

而数字治理机构协调机制的不完善进一步凸显了上述问题。在多边合作层面,金砖国家网络安全工作组在人工智能伦理标准制定中,因各国对技术主权、数据控制权及算法透明度的诉求差异,长期未能形成统一规范。在全球层面,联合国作为最具广泛代表性的治理平台,因成员国利益多元、决策程序复杂,而在数字治理议题上往往陷入共识难求、行动迟缓的困境。例如在跨境数据流动规则、人工智能全球监管等关键领域,联合国长期无法出台具有时效性和强制力的协调方案,使得因法律体系差异引发的合规风险与治理真空相互叠加,“全球南方”的企业在全球数字竞争中的弱势地位再次凸显。

四、数字时代“全球南方”数字协同实践的未来趋势

全球化进程虽不断向前推进,但并非总是线性发展。有学者指出,在多极化进程中南方新兴国家对北方国家主导地位的冲击、全球性问题解决时南北方利益诉求的分歧、南方国家革新现存国际制度的迫切需求,以及全球治理机制的交叉重叠与碎片化等多重因素相互交织,共同加剧了全球协调与合作的难度。^② 数字领域成为“全球南方”突破治理困境的关键战场,在此背景下,“全球南方”的协

^① Giulia La Scala, “CLOUD ACT vs. GDPR: United States and European Union Clash over Data Protection,” November 14, 2019, <https://www.fordhamilj.org/iljonline/united-states-and-european-union-clash-over-data-protection>.

^② 耿协峰:《比较地区主义视角下“全球南方”崛起的实践逻辑》,《太平洋学报》2025年第2期,第12页。

同实践显得更为重要。基于近期相关政策文件与实际合作动态,本文以为“全球南方”数字协同实践的强化将主要围绕以下三大趋向展开:

(一) 强化内部自主能力建设

在全球数字地缘政治的复杂背景下,“全球南方”正面临日益严峻的数字服务贸易限制。自 2008 年以来,全球范围内的数字服务贸易限制性指数持续攀升,折射出数字领域竞争的白热化态势(见图 2)。这一趋势不仅反映了全球数字领域竞争的加剧,也凸显了“全球南方”在推进内部自主能力建设方面的紧迫性和重要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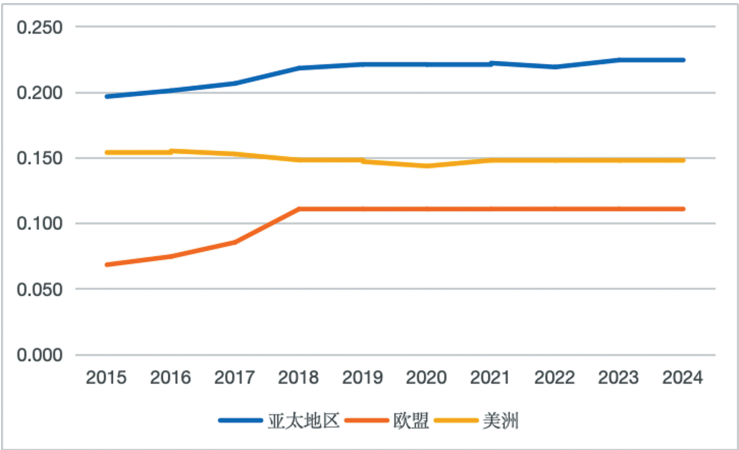


图 2 2015-2024 年全球数字服务贸易限制性指数平均值^①

图表来源:作者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公布的最新数据计算整理。

世界银行指出,“数字化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变革性机遇……唯有构建具备可用性、可负担性与安全性的基础设施和平台,发展中国家才能蓬勃发展。”^②这一论断为“全球南方”的数字化转型锚定了方向。展望未来,南方国家将以数字基

①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数据库未公布欧盟数字服务贸易限制指数,本文以欧盟 27 国中 22 个国家数据的平均值代表欧盟限制水平,未涵盖保加利亚、克罗地亚、马耳他、塞浦路斯和罗马尼亚。此外,还计算了亚太 19 国、美洲 18 国的均值。

② World Bank,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verview,” April 21, 2025, <https://www.worldbank.org/en/topic/digital/overview>.

建为根基、数据治理为核心,在可用性与安全性并重的技术框架下探索适配本土需求的数字化路径。从趋势看,其创新实践将突破当前场景应用的局限,向构建自主可控的数字生态系统演进,为全球数字治理提供多元解决方案。

近年来,学界对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所带来的多维度效应展开了深入探讨,经济效应与环境效应均表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好处良多,推进数字基建势在必行。学界的关注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方面:数字基础设施可通过优化信息、提升资源配置效率、促进创新和降低交易成本来增强企业生产力;^①数字基础设施能够促进企业间的知识传播来提升创新绩效;^②数字基础设施能通过扩大劳动需求、减少重复性工作,促进就业。^③ 在环境效应方面,通过数字化手段减少对实体资源(如原材料、能源等)的依赖;^④数字技术可以通过提高供需匹配效率、能源效率和清洁能源比例,促进绿色技术创新,以较低生态成本实现高质量供应。^⑤

鉴于数字基础设施在多维度展现出的显著效益,当前“全球南方”正积极顺应这一趋势,进一步加大对数字基建的战略投入力度。以埃塞俄比亚为例,该国2019年出台新电信法案并成立独立监管机构,2021年6月向新私营全服务电信运营商发放牌照。在2018-2020年改革期间,宽带用户数增长29%,价格下降超50%,^⑥还催生移动支付等新服务。国际开发协会、国际金融公司和多边投资担保机构协同推动该国电信行业竞争力提升,这一实践也体现出“全球南方”数字基建目标从最初的“填补技术空白”逐渐转向“构建自主可控的数字治理生态”。随着数字化进程的深入,数字基建不再局限于单纯的功能性“技术工具”,而是进

① Zhang Liangliang, Tao Yunqing and Nie Cong, “Does Broadband Infrastructure Boost Firm Productivity? Evidence from a Quasi-natural Experiment in China,” *Finance Research Letters*, Vol. 48, 2022.

② Caroline Paunov and Valentina Rollo, “Has the Internet Fostered Inclusive Innovation in the Developing World?” *World Development*, Vol. 78, 2016, pp. 587 ~ 609.

③ Daron Acemoglu and David Autor, “Skills, Tasks and Technologies: Implications for Employment and Earning,” in David Card and Orley Ashenfelter, eds., *Handbook of Labor Economics*, Amsterdam: Elsevier, Vol. 4B, 2011, pp. 1043 ~ 1171.

④ Ahmed Usman et al., “The Effect of ICT on Energy Consump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in South Asian Economies: An Empirical Analysis,” *Telematics and Informatics*, Vol. 58, 2021.

⑤ Jonathan D. Moyer and Barry B. Hughes, “ICTs: Do They Contribute to Increased Carbon Emissions?” *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 and Social Change*, Vol. 79, No. 5, 2012, pp. 919 ~ 931.

⑥ World Bank, “Digital Development Global Practice,” 2023, <https://thedocs.worldbank.org/en/doc/b16e2ba1cb754ab47a2dd1b214dd374e-0400062023/original/DigitalDevelopmentBrochure.pdf>.

化为承载本土治理智慧的复合型“治理载体”。

尽管在推进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过程中,“全球南方”面临着资金短缺和技术落后的挑战,可能导致建设进展缓慢、难以满足快速发展的数字经济需求,但国际电信联盟成员国共同确立的两大战略目标——实现全球普遍互联互通和推动可持续数字化转型,充分彰显了各国对完善数字基础设施的迫切需求与坚定决心。各国应携手合作,克服困难,共同推动数字基建的发展,以充分发挥其在经济和环境等方面的积极效应。

(二) 深化多层次数字合作

历史上,万隆会议、不结盟运动、七十七国集团等机制作为南方国家争取权益的重要平台,充分验证了多边机制对国际合作与发展的推动作用。但数字时代下,全球治理体系在应对数字技术引发的金融市场波动、数据治理失衡等新挑战时,暴露出传统多边机制的局限性。联合国《2024 年数字经济报告》虽提出助力南方国家发展的构想,却因多方利益博弈、资源分配不均等问题,在实际落地中阻碍重重。在此背景下,弥合发展差距对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推动边缘化地区数字化发展尤为迫切。南南合作与三角合作作为一种创新模式,为解决数字鸿沟提供了新路径。

在实践层面,南南合作与三角合作成效显著。孟加拉国“创新之志”计划通过建立数字中心,为边缘化群体提供信息和服务,且该模式已在马尔代夫、不丹和斐济等国复制,彰显了南南合作在区域间推广成功数字倡议的潜力。此外,南南合作还促进了数字治理知识与专长的共享,如印度数字金融服务的成功经验激励了非洲国家探索类似模式,助力构建包容性金融体系。

从现实逻辑看,全球性数字问题的复杂性推动合作升级。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凭借技术霸权和规则主导权,对“全球南方”实施遏制。美国以“数据跨境自由流动”扩张数字霸权,欧盟以“隐私保护”构筑制度壁垒,使“全球南方”在技术代差与规则博弈中处于劣势。在此情况下,单一的南方国家难以应对,唯有深化区域及南南合作,整合资源、抱团取暖,才能增强议价能力,打破外部封锁。

经济格局变化也为合作创造了机遇。2024 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显示,

全球经济增长动力正从七国集团国家向金砖国家等新兴经济体转移,未来5年金砖国家将在全球经济增长中占据更大份额,^①这意味着“全球南方”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上升,彼此经济互补性凸显,为深化合作提供了有利条件,这进一步提升了“全球南方”在数字领域深度合作的可能性。

基于上述原因,“全球南方”将依托多层次数字合作机制,拓展外部数字伙伴关系网络。此举不仅有助于整合数字资源、提升集体议价能力,还能为其在国际数字事务治理中发出统一声音奠定基础。通过深化数字伙伴关系,“全球南方”将渐进积累数字话语权,为参与全球数字规则制定、推动数字治理体系变革创造条件。

(三)革新全球数字治理体系

在数字经济成为全球增长核心驱动力的背景下,“全球南方”正面临数字治理规则滞后于技术发展的结构性矛盾。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2023年报告显示,全球超过130个国际经贸协定中包含数字规则,其中数字服务贸易体量排名前十的国家创制、签署了超过70%的数字经贸协定。世界贸易组织电子商务谈判中,多数“全球南方”国家数字基础设施薄弱、头部企业缺乏、数字技能和监管手段不完善,谈判能力和意愿不足,合并文本中,发达国家提案条文占比约为71%,导致数字经贸规则话语权集中,“全球南方”在数据主权、跨境流动、技术伦理等关键领域长期处于被动跟随地位。

然而,从长期趋势来看,“全球南方”重塑全球数字治理体系具备三大核心驱动力,支撑其从“规则边缘”迈向“治理中心”:其一,“全球南方”的群体性崛起打破权力垄断。新兴经济体已具备从技术创新到规则输出的全链条能力,其群体性崛起正在瓦解西方对数字规则的单一主导权。这种权力结构的变化,使得全球数字治理体系的构建必须纳入更多元的声音与诉求,促使治理体系从“单极主导”向“多元共治”转型。其二,区域整合构建集体议价基础。“全球南方”通过

^① Alexandre Tanzi, “IMF Sees Growth Shift Toward BRICS and Away From G-7 in New Outlook,” Bloomberg, October 23, 2024, <https://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24-10-23/imf-sees-growth-shift-toward-brics-away-from-g7-in-new-outlook>.

多层次区域机制积累规则谈判筹码,区域性实践不仅形成差异化的数字治理经验,更通过“碎片化创新、区域整合、全球推广”路径,将本土规则转化为国际共识。这些区域合作成果逐渐融入全球治理体系,丰富了全球数字治理规则的内涵与外延,推动全球治理体系从松散的规则拼凑,向更具系统性、协同性的规则体系演进。其三,技术范式变革创造规则重塑窗口期。人工智能、区块链、物联网等新兴技术的突破性发展,正在打破传统数字治理框架。这些创新不仅赋能本土治理,更促使全球治理体系中的技术标准、数据流动规则、安全规范等核心要素进行重构。新的技术应用要求全球治理体系建立与之适配的制度框架,推动整个体系向更包容、更灵活的方向发展。

五、结 语

在数字技术重塑全球权力版图的浪潮里,“全球南方”积极进取,在技术、数据、文化等多领域协同发力,以创新实践探寻破局之路。“全球南方”的数字协同实践意义深远:对内,“全球南方”协同实践凝聚强大合力,优化资源配置、协调政策举措,显著提升了“全球南方”在全球数字经济中的竞争力与影响力;对外,“全球南方”有力挑战数字霸权,为全球数字生态注入公平、包容的关键要素,助力其向更合理、更普惠的方向发展。

不可否认,“全球南方”在解构依附、构建新型协作的道路上,依然面临着重重阻碍。但“全球南方”锲而不舍的协同努力,正持续为全球数字生态注入重要的平衡力量。通过技术赋能激发创新活力、促进文化共生兼收并蓄、推动规则重塑革故鼎新,“全球南方”有望在数字时代的权力重构中,践行全人类对公平公正、普惠包容的数字未来的殷切期望,重塑以多元文化交融和技术协作为基石的全球数字权力新架构与运行体系,进一步推动全球数字权力生态朝着互利共赢的未来迈进。